

论作为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①

邓小平理论

● 王立胜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论作为思想体系和价值 体系的邓小平理论

王立胜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作为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邓小平理论/王立胜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073-2352-8

I. 论… II. 王… III. 邓小平理论-研究 IV. 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9955 号

论作为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邓小平理论

著 者/王立胜

责任编辑/王春明

封面设计/慧 泉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编辑热线/63095932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680 × 960mm 16 开 23.5 印张 250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500 册

ISBN 978 - 7 - 5073 - 2352 - 8 定价: 3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这本文集收录了我从 1994 年到 2006 年十几年间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学习和研究的一些成果。这十几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走向深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时期，同时也是转型社会特征日益凸现、社会风险逐渐积聚、社会结构发生重组的时期；这十几年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身份角色发生巨大转变、心态和思维方式产生明显变化的时期，我从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的一名教师、一名专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中共潍坊市委副书记，继而成为昌乐县政府县长，又成为中共山东省青州市市委书记。无论身份怎样改变，工作多么繁忙，我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学习研究的兴趣却丝毫没有减弱，反而随着实践经验的逐步增长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入，愈发深刻地感受到邓小平理论的思想魅力，感受到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指导作用和解释能力。进一步说，从一个单纯的研究者转变成为一名实践当中的研究者，对我个人而言，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研究视角的改变和思维层次的提升，更在于使我能够有机会在具体工作中切实地实践邓小平理论，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将理论转化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回顾自己取得的一些工作成绩，无论是昌乐县 5 年间在全国县级竞争力综合排名中上升 100 多位，还是到青州工作一年多开

创的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无不与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不懈努力息息相关。

在2007年出版这本文集有两重意义。首先，2007年是邓小平同志逝世10周年，我想以这十几年来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成果纪念和缅怀邓小平同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令世界惊叹的巨大成就无可置疑地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验证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站在今天回顾过去的这一段历史，浩瀚大潮扑面而来，更觉得波澜壮阔，气象万千。

同时，我想以这本书纪念我的硕士导师樊瑞平先生逝世一周年。1988年我负笈山东大学哲学系樊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在樊先生指导下，我初窥学问门径，发现了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大精深、奥妙无穷，师从先生游学三年，读书、做人，受益终生。在我撰写硕士论文期间，先生为我提供了历经几十年收集的全部学术资料，并且不辞辛劳与我反复推敲，这是我的硕士论文能够得到学术界一致好评，并且在3年以后经修改以《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为题出版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的重要基础，也是我能在不到35岁时就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山东省拔尖人才称号的重要基础，能遇到这样的导师，是我的大幸。樊先生是他那个年代中标准的知识分子，勤勉、刻苦、严谨，有极强的人格操守，这些同样对我影响至深，使我无论做人、为学、为官都能够自省自律，能够胸怀坦荡，能够无愧于心。樊先生于2006年3月10日去世，至今已一年有余，但是想起我求学时的情形，想起与先生18年相处的情形，想起先生对我学习、成长、生活各方面的关心，樊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先生去矣，作为学生，以这本凝聚着先生心血的文集纪念

他，应当是对老师最好的安慰。这本书献给我的老师樊先生。

这本文集以《论作为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邓小平理论》为题，是想着重阐明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关于这个问题许多学者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说明和充分的论证，本书力图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强调。只有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来加以学习和考察，才能够深刻全面地掌握其思想实质和理论精髓，任何理论体系都是自洽的，也就是说在理论系统内部是无矛盾、无冲突的，各个具体组成部分是能够相互支持、相互说明和相互促进的，邓小平理论在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方面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本书从方法、体系、内容、价值四个方面对邓小平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论述。

其次，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任何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协调无数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的个体形成基本的社会秩序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就会陷于混乱甚至导致解体。而社会秩序的根本来源则是一套完整的价值解释和说明系统，当这套价值体系被人们认可而且内化为自觉意识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和组织之间、人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与关系规则就随之形成，人们的行动、社会的运转就在这一套关系模式的框架下开始运行。价值体系的基本作用有两个方面，一为方向性，二为解释性，它规定着人们思维和行动的基本方向，并且提供给人们一套理解和解释客观世界的符号体系，从而使人们可以认识自己、解释世界。

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言：思考历史就是对历史作时代分期。就核心价值体系视角来看，中国历史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在此过程中经历了五次转折。周公制礼为第一阶段；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创儒家思想，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

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思想大混乱、大交融，儒家在衰落后吸取佛学和道家精神走向复兴为第三阶段；宋明理学创立与稳定为第四阶段；清末以来西学冲击下的大变局导致思想和价值上的极度迷失混乱，在西方思想于中国传统的撞击融合中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核心价值体系转型的第五个阶段；1978年以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市场化的进程，全球化与市场化相结合，对中国传统价值与革命话语进行着双重的切割与消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无序的状态，这也预示着将有新的、具有现代性和全球性特征的核心价值体系将会逐渐显现，此为第六个阶段，它具备与此前相当不同的性质和内容。

中国一个相当普遍的观念是，人类有一个最终合理的秩序，而对于这个秩序应该有一个非常圆满的解释系统。古代中国的主流思想世界的中心，就是论证和建构这种解释系统：它需要说明天地的空间和时间格局，帝王和帝国的政治结构，人间的社会伦理道德，自然的万事万物，是如何被完美地纳入这一秩序中的。当这种秩序和相应的解释系统与统治者的政治理想相契合时，便会借助政权的强制力和种种制度化的运作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放眼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是儒家学说。秦汉之际，由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经董仲舒的改造最终以经学的理论形态被推至“独尊”的地位，确立为社会核心价值系统。魏晋以至于隋唐，儒学作为本土价值系统在与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和道教这一同根文化的碰撞、融通、交汇中取得了教义与文本上的统一和内容上的改进与完善。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會基础的变化相适应，宋明时期，儒学逐渐从一种“齐家”之说和治平之术发展成心性之学——理学。儒学由私学演化为官学，

由一家之言跃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持续两千多年之久，固然与自身与时演化、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性有关，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这一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基础和专制王权的高度契合。中国的封建制度由于有这样一套完整的绵延相续的价值系统和解释说明体系，虽历经朝代更替却仍然保持了制度上的稳定性，保持了大致相仿的社会秩序模式。清朝末年以后，原有的价值体系再也无法解释现实世界，无法向人们解答和说明维系这种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思想的大混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解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由于其强大的解释能力最终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翻转基层社会，重建中国社会基础，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根源，并且在1949年以后以此为主流意识形态激励和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化因素的增强和市场力量对社会资源配置能力的加强，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分化，都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全球化因素的凸现，也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问题都指向于前述的基本问题——社会秩序如何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回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如何有机整合各方面的思想传统，为建立新的、稳定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原则的社会秩序，而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则在于，这种社会秩序的价值根源是什么。这就是不断发展着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从更加具体的方面来说，我作为一名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在工作中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县域范围内的城乡统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县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在指

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着力点应当是农村社会基础的再造，即针对当前的社会理想、国家目标或现代化导向，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农民之间的联接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农民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造，使得二者之间能够有高度的契合，能够实现顺利的对接。^①相应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便可以理解为农民如何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与国家力量相配合实现国家目标并获取自身福利的实践过程。改革以来，市场化因素的发育一方面在消解着农村地区的传统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在侵蚀和消解着经过长期努力而在农村地区培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这种双重的消解与其他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很多农村地区失去了内生性发展的动力和底蕴，也使党在农村地区的威信、战斗力、凝聚力受到很大影响。由于农民缺乏统一的价值体系作为维系的纽带和手段，因此很难形成合作能力与一致行动的能力，农民的原子化现象日趋严重，农村地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无法形成，在道德底线被普遍突破的情况下，所谓“依法治国”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谈；由于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在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认同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因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基层政府与农民的行动不能够协调一致，不能形成双方的彼此认可，不能形成“官民合作”的体制和局面，使得农村建设受到很大影响。在社会主义新

^① 参见王立胜：《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载《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王立胜：《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原型与核心命题——从社会基础概念的角度》，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8期；王立胜：《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之再造——重读毛泽东〈组织起来〉》，载《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王立胜：《农村社会基础之再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农村建设过程中，不但要制定完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而且必须要建立一整套完备的、内在和谐的对政策体系的价值和理论说明系统，这恰恰是目前十分欠缺的。这个过程客观上要求政策和制度必须从一个统一的理论和价值系统中推演出来，这样才能够有高度的配套性和内在和谐性。但是当前各种不同的具体农村政策却各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理论和价值背景，这种情况下，在实践中使这些政策成为互相支持和配合的政策体系是非常困难的。当前如果单独评价某一个政策的绩效或许是很好的，但是这一系列政策在农村地区同时施行却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各项政策无法形成合力推动农村发展，有时甚至会互相影响、互相抵消，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无所适从，开展工作困难重重。农村社会基础的再造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工作内容，而完整的价值体系建设则是这一工作的本质所在。

长期以来，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理解集中在政策、策略和思想方面，我们对邓小平理论对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以及具体工作的指导作用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并且能够在实践中自觉地去运用它。但是忽视了邓小平理论作为价值体系的重要作用，或者说，只注意了“工具理性”的一方面，却忽视了“价值理性”的另一方面，这就导致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无法对社会现实做出有效说明，无法使人们自觉地接受成文规范的约束，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成本无限加大。邓小平同志强调过的“改革的最大失误在教育”以及批评的“一手硬、一手软”指的就是这种情形。这也正是本书将“价值体系”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属性的原因所在。将邓小平理论视为价值体系，就要求我们摆脱此前在一定程度上将邓小平理论实用主义化的倾向，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角度重新认识和理解邓小平理论，不但将邓小平

理论作为确定发展战略和制定具体政策的理论来源，更要将其视为制度、战略和政策的强力精神支撑，视为重建社会秩序、重组社会结构的精神和价值来源。将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统一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是完整的邓小平理论。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这是中共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所作出的重大决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最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和基础性工作，这一任务的提出，意味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突破技术层面的调整模式，而真正达到深入的程度，开始对整个社会秩序和结构实施全面的变革，这是具有新的质的规定性的改革阶段的序幕。在这个历史性任务面前，更加需要强调邓小平理论作为价值体系的属性和重要作用，这是将邓小平理论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的客观要求，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较大，反映了我作为一名研究者思维方式的改变历程，反映了我的思维水平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也反映了这十几年来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历程，对邓小平理论理解的不断深入，其实就是中国改革不断走向前进、不断走向深入的实践过程的真实反映。

目 录

前言	(1)
论邓小平理论的生命力	(1)
关于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思考	(16)
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论纲	(27)
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进程的哲学反思	(104)
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114)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探析	(162)
邓小平对“重要战略机遇期”思想的贡献	(179)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研究	(19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战略地位的认识历程	(271)
论作为哲学家的陈云	(287)
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301)
论孔繁森精神的价值生成和价值涵量	(317)
走向崇高：共和国英雄群体的精神世界	(326)

论邓小平理论的生命力^①

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重重压力，而且越来越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正如江泽民所说：“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综合国力愈益强盛起来，人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社会主义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② 举世公认，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光明的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

问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什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生命力的源泉和走向，这些问题引来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目光，也吸引了一些政治家和领导者的注意。人们尽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使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但是有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即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生命力诚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邓小平理论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① 本节原载于《理论探讨》1998年第3期，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7期转载。

^② 《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江泽民同志致悼词》，载《求是》1997年第5期。

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员、莫斯科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布坚科博士在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时，通过比较研究，对于“如何解释中国无可争议的成功和俄罗斯显而易见的失败”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起因不在客观情况，因为两国的起点条件是相似的，而在于主观因素，在于当局的政策，在于中俄两国改革派理解本国国情并在寻找走出困境的战略和策略方面能力的不同。”“中国领导人认为没有什么比理论更实际的了。因此，他们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状况之后得出结论：必须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只有解决了经济问题，保证 12 亿中国人生存的物质条件，才能着手解决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中国改革的近期和远期目标及其次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而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忽视了理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派及后来取代他们的叶利钦的改革派均没有符合实际的理论，没有明晰的、分阶段的、完整的使俄罗斯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变的概念。”^① 这些结论向我们表明，苏联改革的失败和中国改革的成功，尽管有着多种因素的作用，但有无符合实际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苏联改革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没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理论作为指导，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对于中国改革的成功则具有根本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经典理论家们的这些至理名言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熠熠之光。作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是深知理论的重要性的。中国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指导，这个理论指导

^① [俄] 阿·布坚科：《四条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国际社会与经济》1996 年第 10 期。

当之无愧的是毛泽东思想，但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针对当时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僵化态度，邓小平尖锐指出：“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①在改革的实践中，邓小平致力于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终于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进展正是得益于这一理论的指导。应当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生命力正是根源于邓小平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中所指出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受住了实践检验和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生命力。”由此我们认为，研究邓小平理论的生命力就应当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大生命力的重要一环。那么，邓小平理论的生命力在哪里呢？

一、邓小平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在于 它的合规律性，即客观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性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邓小平理论正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正确反映。

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看，它准确地抓住了时代的本质，反映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了时代的内容和要求。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①

1. 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是对整个世界历史格局和世界历史时代主题的深刻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一方面，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两极格局逐渐被打破，各种力量在重新组合，新的世界格局开始形成，世界范围内制约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争取和平的呼声日趋高涨，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和；另一方面，由于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现代科学技术的日趋发展，国际贸易的广泛进行，使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的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着发展的问题，而且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着继续发展的问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的众多矛盾，都是围绕着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展开的。邓小平正是从这种世界格局的变化出发，对世界历史的时代主题进行了新的审视和思考，作出了“延缓世界大战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等正确判断，进而又在这些判断的基础上延伸开来，精辟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② 从而得出了和平与发展已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结论，这就使我们彻底纠正了对世界历史时代主题认识问题上的偏差，真正地把发展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作为时代的核心问题来认识和对待。

2. 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初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①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向自然界开战，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为此设想过多种计划和方案，进行过艰苦的实践，但终因经验缺乏，理论准备不足，再加上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走上了通过阶级斗争去促生产、促发展的轨道，还出现了严重偏离发展主题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中国陷入困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深刻反思近代，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审慎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存在的问题，既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又纠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3. 是对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理论的积极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的明显特点，就是底子薄、基础差、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其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曾做过艰辛的探索，成绩巨大，但教训也极为深刻。当历史的列车把中国带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6，833页。